

我父亲的手提箱

——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词

[土耳其]奥尔罕·帕慕克

万之译

我父亲去世前两年，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，里面装满了他的手稿和笔记本。他用平常那种玩笑调侃的口吻要我在他走后读一读，“走后”的意思是说他离开人世。

“你就看一看，”他说，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，“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用得上的东西。也许等我走人的时候，你可挑选一点东西发表。”

我们是在我的书房里，在书的包围之中。我父亲想找个地方把手提箱放下，前后走来走去，好像一个人要急于甩掉什么痛苦不堪的包袱。最后，他把箱子悄悄放到一个毫无遮蔽的墙角。这是一个我们都不再忘记的尴尬时刻，但这个时刻一旦过去，我们就回到我们通常的角色，生活轻松自如，我们爱开玩笑的调侃的个性恢复，也就不再紧张。我们像过去那样交谈，谈点日常琐事，土耳其没完没了的政治麻烦，还有我父亲的差不多失败的生意，而没有感觉过多悲哀。

我记得，父亲离开之后，有好几天我走来走去经过手提箱，都没有碰它一下。我已很熟悉这个小巧黑色的皮质手提箱，熟悉它的锁，它的圆滑的箱角。父亲不出远门短途旅行的时候常带着它，有时用它装文件上班。我记得，我还小的时候，父亲旅行归来，我会打开这个小手提箱乱翻他的东西，品闻异邦外国给箱子带来的香水味。这个箱子对我来说是个老熟人，一件让我唤起清晰童年记忆的纪念品，而现在我甚至不敢碰它一下。为什么？毫无疑问，这是因为里面装的东西有神秘莫测的重量。

现在我要说到这些重量的意义。这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，是一个人退却到一个角落里表达自己的思想——这就是文学的意义。

我几乎不敢碰父亲的手提箱或是打开它，但我知道里面的一些笔记本写了什么。我见过父亲用其中一些笔记本写什么东西。这并非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沉甸甸的东西。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，他年轻的时候，在上世纪40年代末，在伊斯坦布尔，他希望成为一个诗人，还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作品翻译成土耳其语，但是，在一个贫穷的没有几个读者的国家写诗，这样的文学家的生活不是我父亲要过的生活。父亲的父亲——我的祖父——是一个富有的商人；所以我父亲的童年、少年都是过着舒适的少爷生活，他不想为了文学、为了写作忍受艰难。他喜爱美好的生活，这我可以理解。

有种不安让我和父亲的手提箱里装的东西保持距离，这首先是我害怕我不喜欢我读到的东西。我父亲早料到这一点，所以有意装做他对箱子里的东西毫不在意的样子。在从事写作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看到这一点，这让我难过。但是我并不想生父亲的气，责怪他没有真正把文学当回事……我真正的恐惧，我不希望知道或发现的关键的事情，是我父亲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。因为有这种恐惧我才不敢打开我父亲的手提箱。更糟糕的是我自己也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。如果真实而伟大的文学从我父亲的手提箱内出现，我就不得不承认在我父亲身上存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人。这是令人恐惧的可能性。因为即使到了成年的年龄，我还是要父亲仅仅是我的父亲，而不是作家。

要做作家，对我来说意味着长年累月耐心尝试发现自己内在的另一个秘密存在，一个使其成为其人的内在世界：当我说到写作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部小说、一首诗歌，或文学的传统，而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，坐在一张桌子前，独自一人，转向自己的内心。在内心的阴影之中，他用词语建立起一个世界。这个男人或者女人可能用一台打字机，或者利用一台电脑的舒适方便，或用笔在纸上写，就像我自己就这么写了三十年。他可以边写边喝茶、喝咖啡，或边写边抽烟。有时候他会从桌前站起来，透过窗户看看街上玩耍的孩子，或者他运气好的话，还能看到树林，看到风景，或者他只是目睹一面黑墙。他可以写诗，可以写剧本，或写小说，就像我一样。所有这些区别都是从桌边坐下来耐心地向内心这个艰巨任务开始。要写作就是要转向内心凝视词语，要研究那个退入其中而其人走过的世界，而这需要耐心、要固执，也要有乐在其中。当我坐在桌前，一连数日，一连数月，一连数年，慢慢把新的词语添加到空白的纸上，我感觉